

研究与借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现状述评

——以部分英文著(编)作品为例

张祥熙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梳理和评述的华侨华人研究文献主要是以汉语为语言媒介,而对于以其他语言为媒介的文献关注度明显不够。本文选取的评述对象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文献。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呈现出地域范围囊括全球、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研究、研究的主题和学科参与多样化等特点。而且,这些以英语为语言媒介开展研究的学者们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研究精神和实践值得我们学习。但与此同时,仍存在国内学者外语能力不足,在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中,中国学者的参与度不高,无法与国际同行有效交流与对话等缺憾。如若能克服以上不足,国内学者定能在华侨华人研究这一世界事业中烙下鲜明的中国特色。

关键词 华侨华人 英语 研究现状 语言媒介

一、前人对华侨华人研究文献梳理和述评之简要回顾及本文的研究问题和切入点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现象古已有之,但对华侨华人的学理性研究则是近代以后的事。19 世纪中后期,南洋殖民地政府为了对华侨实施有效统治而专门培养了一批专家以提供政策咨询,他们以殖民主义国家所使用之语言为语言媒介,首开对南洋华侨学理性研究的先河。至 20 世纪初,国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界前辈开始了以汉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类学学理性研究。^①

根据研究者所处地域以及所使用语言的不同(本文以英语为例),可以将华侨华人的研究划归四个象限^②(见下页图一)。国内学者对第 I 象限和第 III 象限内的华侨华人研究现状关注较多。其中,第 III 象限的华侨华人研究大都是国外老一辈使用汉语的华侨对华侨华人问题展开的研究,这在华侨华人研究初期较多。国内学者在梳理文献时,一般把它们纳入“国内以汉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范围,即第 I 象限内。例如,李安山教授对明清以来中国学者关于华侨华人研究情况的做了述评,并高度赞扬了梁启超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果。^③姜樾以编撰《华侨华人研究著述题录(1976—1989)》一书的亲身实践对改革开放头 14 年的华侨华人研究现状进行了

^① 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参见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载《世界民族》,2009 年第 1 期。

^② “象限”原本是数学概念,指以原点为中心,以横轴、纵轴为分界线,按逆时针方向由右上方开始分为 I、II、III、IV 四个象限,原点和坐标轴不属于任何象限。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来指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内,由于研究者自身所处的地域和使用的研究语言之不同而形成的次一级的华侨华人研究的范围。

^③ 参见李安山《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的典籍笔记和研究概述》,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

概括和评述。^① 梁志明教授从学术文章和著作、研究队伍、研究观念、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华侨华人研究做了综述。^② 庄国土教授在21世纪初更是对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做了详尽回顾,并评述了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他将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历史进程概括为“肇基于清末,发展于民国时期,受挫于上世纪50—60年代,复兴于改革开放以后”。而且他进一步指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无论是在学科参与、研究视角创新以及国际化水平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但整体上“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第一手资料匮乏与低水平重复等问题”。^③

图一:华侨华人研究象限分布示意图

	汉语	英语
国内	第 I 象限 国内以汉语为语言媒介的研究	第 II 象限 国内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研究
国外	第 III 象限 国外以汉语为语言媒介的研究	第 IV 象限 国外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研究

与此相对的是,国内学者对第 II 象限和第 IV 象限内的华侨华人研究现状的梳理和述评则远不及对第 I 象限和第 III 象限内华侨华人研究现状的梳理和述评那么详尽和完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学者们的研究需要和研究旨趣所决定。研究综述的撰写是学者研究需要的反应,也是学者开展研究的前提。就华侨华人研究而言,不同学者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旨趣不尽相同,对华侨华人研究现状的述评自然也就不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障碍。华侨华人的分布遍及世界各地,各国所使用的语言不尽相同。受此影响,身处不同地域的学者对华侨华人研究所使用的语言也就会不尽相同。以汉语为语言媒介的学者在没有全部掌握以其他语言为媒介的学者开展华侨华人研究所使用的语言的前提下,想要对以其他语言为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现状作一整体梳理和评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仅如此,文献传播和获取技术的限制也是我们无法达成这一目的的因素之一。尽管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被称之为互联网时代,学术研究所需文献的传播与获取的便利性与之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但由于技术和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我们还是无法获取到研究所需的全部资料。正因为如此,即使有学者已经尝试对以其他语言为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现状做出梳理和述评,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④

那么,时至今日,以其他语言为媒介的华侨华人的研究现状又如何了?有何新特点?同样受研究旨趣、语言媒介、样本获取途径以及精力和能力所限,本文拟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著(编)作品为样本,尝试将第 II 象限和第 IV 象限内华侨华人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作一梳理和述评。^⑤

① 参见姜樾《从<题录>看中国(大陆)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现状》,载《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2期。

② 参见梁志明《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③ 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

④ 国内学者对以其他语言为媒介的华侨华人相关研究现状的述评可参见范若兰《新马华侨华人妇女史研究述评》,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过放《日本神户华侨华人研究史概论》,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研究述评》,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沈红芳《菲律宾的华侨华人研究现状及其思考》,载《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6期;李枫《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现状述评》,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吴丹、张秋生《大洋洲华侨华人研究综述》,载《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1期;邱志红《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中文研究著述为中心》,载《暨南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2期。

⑤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本文也无法做到全面分析,只能作一片段梳理。文中观点也难免主观武断,甚至以偏概全。

二、本文研究样本的选取及样本本身的简要分析

本文研究样本^①——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英语著(编)作品是笔者在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9 月间,在“创世纪图书馆”(Library Genesis)数据库中以“Overseas Chinese”“Chinese Overseas”和“Chinese Diaspora”三个英文词组为标题关键词搜索的结果。结果显示,符合检索要求的电子著(编)样本书籍共有 30 本,除去重复的作品和非研究类的传记作品,学术研究的著(编)样本书籍共有 26 本。^②

表 1: 所选样本所涉及的出版社、出版社所属国家及样本数量统计表

出版社	所属国家	样本数量
路特里奇(Routledge)	英国	8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	英国	4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英国	1
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英国	1
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美国	1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美国	1
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美国	1
博睿出版社(Brill)	荷兰	3
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荷兰	1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加拿大	1
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新加坡	1
新加坡大学出版社(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新加坡	
香港大学出版社(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	3

注:在这些样本中,有一个样本是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和新加坡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故在表中统计样本数量时将其合二为一。

从出版时间来看,这 26 本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著(编)样本书籍既有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也有 2017 年最新出版的,总的时间跨度约有 36 年。从出版机构来看,共涉及包括中国香港、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和新加坡 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 家出版社。这些出版社中,既有世界知名的专业学术出版社,如英国的路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和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荷兰的博睿出版社(Brill)和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新加坡的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等,也有国内(专指香港)外在华

^① 笔者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9 月这两年多时间里,在庄国土教授的指导下,对“华侨华人的世界分布”作过全面的跟踪研究,涉及世界 208 个国家或地区。收集的资料也是各种各样,既有著(编)作类,也有论文类,还有各国或各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统计年鉴等不一而足。资料所使用的语言媒介除汉语外,绝大部分为英语,还有少部分使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即是上述资料中的一小部分。

^②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文献的增加或老文献的撤销,在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这个时间段之外,以同样的关键词搜索,其结果可能会不同。

侨华人研究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大学出版社,如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美国的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和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新加坡的新加坡大学出版社(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和中国香港的香港大学出版社(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但是,出版数量最多的还是世界知名的专业出版社(见上页表1)。由此可以看出,所选样本的学术质量是有保障的。

三、样本所呈现的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现状及特点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步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并逐渐放开了对海外移民的限制,国内许多人通过投亲靠友、家庭团聚、财产继承,甚至是非法移民等方式移居国外,世界华侨华人数量迅速增长。20世纪最后20年里发生了许多与华侨华人有关的事件,如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受此影响造成的东南亚国家经济下滑等。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中国也越来越有实力和自信参与国际事务、参与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还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并在新时期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带动和促进了中国资本和人力资源走向国门,走向世界。这一切使得不论是以汉语为语言媒介,还是以其他外语为语言媒介的学者,都对华侨华人问题给予了持续和足够的关注。

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界自20世纪90年代初,先后专门召开了几次规模宏大的国际会议,对华侨华人不同领域的问题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研讨。例如,1992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一次主题为“落地生根:华人移民的法律、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探讨的是华侨华人由“叶落归根”心理到“落地生根”心理的转变,关注的是华侨华人过往的心路历程,及在“落地生根”心理形成后的政治、经济和法律身份的建构。1994年在香港举行的,以“比较视野下最近半个世纪的华侨华人”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则是旧金山会议的延续,但与前次会议不同的是,此次会议更加关注华侨华人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第一次聚焦战后华侨华人出现的根本变化的国际会议,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世界不同华人社群内华侨华人的生活。2000年8月31日至9月3日,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学者齐聚新加坡,召开了主题为“移民社会与现代教育”的国际会议,深入探讨了包括北美、古巴、印度、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教育以及社会融入等问题。这些会议最后都将优秀成果汇集出版。

此外,一批新兴学者也加入到华侨华人研究行列,及至如今也已成了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中坚力量,如戈德利·迈克尔(Michael Godley)、白莲娜(Elena Barabantseva)、希尔维亚·范·齐格勒(Sylvia Van Ziegert)和理查德·吕(Richard T.Chu)等。这些人在攻读博士期间,都把华侨华人作为研究的对象。戈德利·迈克尔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受其指导老师威廉斯·李(Lea E. Williams)的影响,研究兴趣转向南洋华侨,主要关注的是南洋华侨资本与近代中国工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位以英语为语言媒介、将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华侨华人结合起来研究的非华人学者。^①曼彻斯特大学的白莲娜则是将研究焦点放在当代,把华侨华人和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结合起来研究,比较这两个特殊的群体在构建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进程中的行为和作用。白莲娜认为,无论是在过去

^① See in Michael R. Godley, *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19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还是现在, 华侨华人和少数民族在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都具有重要作用。^① 而希尔维亚·范·齐格勒和理查德·吕本身就是华侨华人后裔。其中希尔维亚·范·齐格勒是华裔美国人, 能说流利的广东话。虽然出生在美国, 但由于有亲戚在德国, 故而她经常前往欧洲, 尤其是德国。在读博期间, 她对美国和德国的华侨华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一本专著, 专门探讨了在美国和德国的华侨华人是如何建构和表达移民身份认同的。作者认为“华侨华人为了明确建构和表达其作为外来移民的身份认同, 主要会采取三种策略, 即要么更加美国/德国化、要么更加中国化、要么把中西方文化融合。”^② 这三种策略并非相互排斥, 相反通常会以不同方式相互交织, 互为补充。理查德·吕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人后裔, 从小就在天主教教会办的汉语学校学习。由于出生于菲律宾, 他自认为自己是菲律宾人, 但别人却总是对他说“你是中国人”(you're Intsik); 当他用他加禄语与人交流时, 别人总会说他是“番仔𧄗”(hoan-á gōng); 他的父亲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乡话——闽南话, 但日常生活中父亲却总是用他加禄语和自己交流……这些小时候看似“矛盾”的生活经历成了他写作博士论文的灵感源泉。在博士论文中, 理查德·吕采用微观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菲律宾华人社会的身份认同, 为我们揭示了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马尼拉华商家庭是如何在“中国人”、“中外混血儿”、“天主教徒”, 以及“菲律宾人”这几种身份转换中做到“游刃有余”。^③

大体而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学界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一是华侨华人研究成了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华侨华人研究参与者的范围突破了早期局限于殖民地国家殖民主义者培养的专家范围, 而是发展成为包含世界各国, 不分族群身份, 只要对华侨华人问题感兴趣的学者都参与其中。不仅如此, 华侨华人研究的地域范围也由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和北美发展到如今的囊括全球。正因为如此, “对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已然成了一项全球性的事业”。^④ 这里仅举一例即可说明问题。从 2009 年开始, 中山大学的陈志明教授汇集了国内国际一批不同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 花了近 4 年时间, 编写出版了《路特里奇华侨华人指南》一书, 共有来自世界五大洲 13 个国家的 32 位学者参与了此书的编写(见下页表 2)。研究的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东南亚华侨华人, 而是包含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拉美和加勒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和南非等五大洲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

二是华侨华人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一直热度不减, 研究主题越来越多样化。与最初更多关注移民史研究不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华侨华人研究主题还涵盖了华侨华人政治参与、身份认同、性别特征以及文化艺术等。即便也是研究移民史, 王赓武(Wang Gungwu) 教授独辟蹊径, 专门研究中国人海上移民史,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大规模移居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的动机。^⑤

在 20 世纪之前, 大部分以英语为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学者更加关注华侨华人的经济成就, 而对华侨华人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政治参与的关注度明显不足。艾米·弗里德曼(Amy Freedman) 出版了一部华侨华人政治参与研究的力作, 有助于我们了解华侨华人在美国和东南亚的

① Elena Barabantseva,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1, p.167.

② Sylvia Van Ziegert, *Global Spaces of Chinese Culture: Diaspor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210.

③ Richard T.Chu, *Chinese and Chinese Mestizos of Manila*,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0, pp.6-11.

④ Michael W.Charney, Tong Chee Kiong, Brenda S.A.Yeoh, *Chinese Migrants Abroad—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3, p.xix.

⑤ See in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政治参与状况。作者在书中指出,“华侨华人在美国受到的政治参与方面的挑战与机制性的约束要远比在东南亚国家更甚”。^① 而玛莲·迪勒曼(Marleen Dieleman)、朱丽叶·科宁(Juliette Koning) 和彼得·波斯特(Peter Post) 合著的《印尼华人与政权更迭》一书把“印尼华人”当作印尼社会不可分割的一员,而非外来者,把政权更迭作为研究主题,为我们呈现了印尼华人在形塑、缓和及促进印尼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多重角色,也为印尼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②

表 2: 参与编写《路特里奇华侨华人指南》的学者及其世界分布统计表

学者姓名	服务机构	所属国家	所在洲
包洁敏(Jiemin BAO)	内华达大学	美国	美洲
陈鼎(Dean P.CHEN)	新泽西拉玛坡学院		
胡其瑜(Evelyn HU-DeHart)	布朗大学		
连培德(Pei-te LIEN)	加利福尼亚大学		
林愿清(Linda Yuen-Ching LIM)	密歇根大学		
令狐萍(Huping LING)	杜鲁门大学		
沈丹森(Tansen SEN)	纽约城市大学		
王保华(Bernard P.WONG)	美中政策研究中心		
杨飞(Philip Q.YANG)	德克萨斯女子大学		
李胜生(Peter S.LI)	萨斯喀彻温大学		
李晓玲(Eva Xiaoling LI)	萨斯喀彻温大学		
余全毅(Henry YU)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徐文英(Wenying XU)	查塔姆大学	墨西哥	
费立民(Flemming Christiansen)	杜伊斯堡-爱森大学	德国	欧洲
赫劳德拉(Isabelle Lausent-Herrera)	法国国家研究中心	法国	
亚历山大·拉林(Alexander G.Larin)	俄罗斯国家社科院	俄国	
李安山(LI Anshan)	北京大学	中国	亚洲
李明欢(LI Minghuan)	厦门大学		
陈志明(TAN Chee-Beng)	中山大学		
庄国土(Zhuang Guotu)	厦门大学		
张幸(Zhang Xing)	北京大学		
陈天玺(CHEN Tien-shi)	大阪国家人类博物馆	日本	
原不二夫(Hara Fujio)	南山大学		
柴田佳子(Yoshiko Shibata)	神户大学		
谢爱萍(Chia Oai Peng)	马来西亚大学	马来西亚	
廖建裕(Leo Suryadinata)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游俊豪(Yow Cheun Hoe)	南洋理工大学		
查尔斯·A·科佩尔(Charles A.Coppel)	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	大洋洲
孙皖宁(Wanning SUN)	悉尼科技大学		
颜清滢(YEN Ching-hwang)	阿德莱德大学		
叶宋曼瑛(Manying IP)	奥克兰大学	新西兰	
凯伦·哈里斯(Karen L.Harris)	比勒陀利亚大学	南非	非洲

资料来源: 根据《路特里奇华侨华人指南》一书所列 Contributors 所绘制。^③

① Amy L.Freedm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Chinese Overseas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85.

② Marleen Dieleman, Juliette Koning, Peter Post, *Chinese Indonesians and Regime Change*,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0, p.15.

③ Chee-Beng Tan,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x-xv.

有关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研究,费立民(Flemming Christiansen)教授以四邑和青田籍华侨华人为例,详细论述了次族群认同的形成。他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建构的结果(what you make of it),它有可能是一种既有“存在”的选择,也可能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① 萧洛克(Lok C.D.Siu)则将目光聚焦于巴拿马的华侨华人,巧妙地把巴拿马华侨华人家庭的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阐述了在移民社会环境中的集体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是如何形成的。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尽管华侨华人在巴拿马的经济地位相对优越,但他们内心却一直充斥着焦虑不安的情绪,这体现了巴拿马华侨华人身上明显的阶层与种族之间的落差。所以,一旦华侨华人感觉到来自巴拿马国内的不友好行为时,他们就会结成临时的、脆弱的、跨越阶层差别的族群联盟以护持自己的利益。^②

华侨华人性别特征的研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一大特色。熟悉华侨华人移民史的人都知道,早期的中国人海外移民大都是男性,因为中国古代就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出外赚钱养家都是男人的事,所以早期的华商几乎都是男性;到了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到中国大量招募和大肆贩卖的“猪仔”华工苦力,也大部分是男性劳力。因此,早期的华侨华人研究,诸如华侨华人栉风沐雨、胼手胝足的移民和创业史,华侨华人在居住国戮力相助、同心协力建构身份认同,实现政治参与,维护自身利益等,都因其研究对象的性别优势,本质上都具有男性化(masculinity)特征。但是,随着华侨华人在性别数量上的差距不断缩小,日趋平衡,对女性华侨华人的关注也就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对女性华侨华人形象气质的关注更是近年来华侨华人研究的亮点所在。邱素玲(Olivia Khoo)在其《中国电影的外国情调:当代女性华人研究》专著中,一改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界定华人女性气质,并将其与复古主义(Primitivism)的观念等同起来的传统做法,将“外国情调”(Exoticism)^③这一概念拿来理解亚太国家现代社会中涌现出来的有别以往的华人女性气质,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理解中国、华侨华人、亚洲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反过来也可以通过这一新理解来解释现代华人女性气质的复杂本质。

华侨华人文化艺术的研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研究界关注的重点,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研究。在邱素玲(Tseen Khoo)和雷金庆(Kam Louie)共同主编的《文化、身份、商品:华人英语文学》一书中就邀请了 12 位学者,分别就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华人英语文学作品展开研究。通过研究,学者们认为,华侨华人文学是华侨华人全球和地方文化经济的一部分,也是多种社会文化意义的载体,能够解释“美学和政治学的密切关系”。^④ 郑苏(Su Zheng)的《移民的诉求:美国亚裔/华裔移民的音乐、跨国主义与文化政治》一书通过对不同的华人音乐团体、不同的音乐风格和演出效果、美国华人音乐家的移民经历、民族的和跨国的媒体形态以及华人音乐社团组织与美国地方的、国家的和跨国的文化机构广泛交往的描述和研究,为我们呈现了异质多样的美国华人音乐文化以及美国华人多元的文化认同。作者认为,音乐是美国华人群体社交、审美乃至政治表达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⑤

三是“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华侨华人,无论移民时间长短,无论距离多么遥远,也无论身份如何,与中国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都会关注这个群体与其祖籍国——中国的关系。戈德利·迈克尔通过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南洋华侨的研究发

① Flemming Christiansen, *Chinatown, Europe—An Explo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73.

② Lok Siu, *Memories of a Future Home: Diasporic Citizenship of Chinese in Panam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82.

③ Olivia Khoo, *The Chinese Exotic: Modern Diasporic Feminin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

④ Tseen Khoo, Kam Louie, *Culture, Identity, Commodity: Diasporic Chinese Literatures in English*,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3.

⑤ Su Zheng, *Claiming Diaspora: Music, Trans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Asian/Chinese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7-8.

现,南洋华侨通过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得到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精英的认可和接纳。于是,他们不得不向祖籍国寻求社会认可,获取足以保护自己的较高的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他们并不是推翻清王朝统治活动的同情者和参与者,相反他们是清王朝统治的维护者。^①作者的这一结论与我们一般认为华侨都反对清朝统治,并出钱出力支持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和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的认识截然相反。庄国土教授对清政府与华侨的关系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晚清政府对待华侨并非只是控制和利用,相反还通过各种方式加以保护。^②这两个观点相得益彰,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晚清政府和华侨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在谈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时,康斯坦斯·莱韦尔-特蕾西(Constance Lever-Tracy)等人将华侨华人当作一个有着自身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的独立群体,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带有某种世界主义态度。尤其是他们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在全球化的今天,正在逐步产生某种经济协同(Economic Synergy)效应。^③而在论及华侨华人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时,有学者认为要受祖籍国和侨居国移民环境的影响。从祖籍国的角度来看,当华侨华人企业家精神与祖籍国相适应时,就能够在侨居国建立和强化华侨华人的社会结构,从而有助于提升他们未来的幸福。^④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回到祖籍国投资兴业,归国华侨华人问题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中国的归国华侨华人》一书是归国华侨华人研究方面内容最为翔实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全面论述了中国的华侨华人政策以及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详细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归国华侨华人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作用。^⑤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为海外华侨华人的华人文化创作和再创作提供了素材和养分,华侨华人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也体现了新的国家理念和新的国家认同。^⑥

四是多学科参与华侨华人研究现象突出。华侨华人研究早已突破了由历史学或民族学所主导的局面,已发展到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参与其中的新阶段。“多学科研究华侨华人,不但是指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华侨华人’需要以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且研究对象本身也蕴含各学科的特定研究内容。”^⑦在迈克尔·W·恰尼(Michael W. Charney)等人编写的书中,涉及的学科包含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理论学等,关注的华侨华人问题有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华侨华人的教育,以及华侨华人的社会融入等。^⑧在研究印尼华人与印尼社会变革时,《印尼华人与政权更迭》一书的作者们娴熟地运用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商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方法。^⑨同样是研究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有的学者采用民族志的叙事方式,^⑩有的学者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⑪也

① Michael R. Godley, *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19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

② Zhuang Guotu, 'China's Policies on Chinese Overseas: Past and Present', in Chee-Beng Tan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31-40.

③ Constance Lever-Tracy, David Ip, Noel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gy*,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pp.62-81.

④ Min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s*,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419.

⑤ See in Glen Peterso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1.

⑥ See in Julia Kuehn, *Diasporic Chineseness after the Rise of China: Communitie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Vancouver: UBC Press, 2013.

⑦ 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

⑧ See in Michael W. Charney, Tong Chee Kiong, Brenda S. A. Yeoh, *Chinese Migrants Abroad-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3.

⑨ See in Marleen Dieleman, Juliette Koning, Peter Post, *Chinese Indonesians and Regime Change*,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0.

⑩ See in Lok Siu, *Memories of a Future Home: Diasporic Citizenship of Chinese in Panam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⑪ See in Kuah-Pearce Khun Eng, Andrew P. Davidson, *At Hom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Memories, Identities and Belongings*,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有的学者从微观历史研究的角度去考察,^①还有的学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②

四、样本所呈现的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可资借鉴之处

如前文所述,华侨华人研究如今已成了全球性的事业,不仅研究的地域范围突破了东南亚的范围,进而囊括全球,参与研究的学者亦来自世界各地;研究的主题也由单纯的华侨华人移民史研究发展到今天涵盖华侨华人政治参与、身份认同、性别特征、文化艺术以及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等多样化的研究主题;从学科参与角度而言,也不再是历史学或民族学单一的局面,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已参与到华侨华人研究中来了。可以说,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已经形成了“全球参与、百家争鸣”的研究局面。在这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借鉴。

第一、注重田野调查,深入挖掘材料。有很多学者在进行研究之前,都经过长期不懈,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从而保证了研究成果的高水准、高质量,推动了华侨华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艾米·弗里德曼为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在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参与行为,先后在美国洛杉矶、纽约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大量的个人访谈和翔实的资料调研。^③为了弄清楚菲律宾华侨华人与菲律宾社会变革之间的关联性,理查德·吕查阅和收集了大量的西班牙语、英语、汉语和菲律宾语的各种资料,包括基督教洗礼和婚姻的记录、归化文件、法庭文书、人物卷宗、书信、报纸、文学作品以及其他出版物、家族宗谱和人物传记等,还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访谈。^④尤为突出的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格伦·彼得森教授为撰写《中国的归国华侨华人》一书,30年磨一剑,多次往返加拿大和中国,收集了大量的中文材料,如官方出版物、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重大新闻报道和中国各地发行的期刊、学术调研报告和有关海外华侨华人的各种新闻报道,并到广州、上海、昆明等有归国华侨华人的地方进行了大量实地访谈。^⑤这些学界前辈这种对学术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善于运用新理论、新视角来研究华侨华人问题。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兴起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曾经风靡一时,许多学者也将这些理论拿来分析华侨华人问题,尤其是华侨华人经济问题。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康斯坦斯·莱韦尔·特蕾西等人在华侨华人研究过程中却并没有借助依附理论或是世界体系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相反,作者们敏锐地注意到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于是他们便借助“全球化”理论和新兴的全球网络分析视角来为他们的华侨华人研究服务,找到了一条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新路径。^⑥

第三、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华侨华人研究历史虽已有一百多年了,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数不胜数,但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不论所使用的研究语言为何,华侨华人研究低水平重

① See in Richard T.Chu, *Chinese and Chinese Mestizos of Manila*,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0.

② See in Kin Yan Szeto, *The Martial Arts Cinema of the Chinese Diaspora—Ang Lee, John Woo, and Jackie Chan in Hollywood*,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Julia Kuehn, *Diasporic Chineseness after the Rise of China—Communitie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Vancouver: UBC Press, 2013; Walter S.H.Lim, *Narratives of Diaspora Representations of Asia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Li Wei, *Multilingu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Worldwide—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and Local Social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15.

③ See in Amy L.Freedm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Chinese Overseas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④ See in Richard T.Chu, *Chinese and Chinese Mestizos of Manila*,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0.

⑤ See in Glen Peterso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1.

⑥ See in Constance Lever-Tracy, David Ip, Noel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gy*,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复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均不同程度的存在。要进一步推动华侨华人研究的深入发展,就需要学者们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在这方面,本文选取的样本中有些学者的做法值得肯定。例如,进入21世纪后,在国内外学者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兴味索然之际,大卫·肯利通过考察1919—1932年间新加坡的各种政治示威活动、报纸文章和不断增多的汉语学校等现象来研究“五四”运动与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华侨的关系,开拓了华侨华人研究与“五四”运动研究的新思路。^①在研究巴拿马华侨华人过程中,萧洛克一反传统的民族学叙事方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被她称之为“断裂事件(Ruptures)”的全新的叙事方式。^②相似的创新还有邱素玲的“异国情调”和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的“全球华语语系”(Sinophone)概念的提出和运用等。^③这些创新的出现,既突出了学者的研究特色,也为华侨华人的研究开拓了研究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研究方向。

第四、华侨华人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是我们未来可以尝试的新路径。早在1919年英国设立世界第一个国际关系讲座教席开始,国际关系学科就诞生了。如今,国际关系学已成为一个基本成熟的独立学科。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不仅有国家、国际组织,而且“人”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华侨华人不仅是“人”,而且还是跨国的“人”。如果把华侨华人排斥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之外,那么华侨华人研究的“多学科参与”就有点“名不符实”之嫌。虽然也有学者作过类似的尝试,但他们要么是简单地借用相关国际关系理论来阐述华侨华人问题,要么就是把华侨华人作为国际关系某种结果的被动承受者来对待,关注的仅是国际关系对华侨华人的影响。华侨华人能否作为国际关系行为者主动地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司徒金源(Kin Yan Szeto)在其作品中给予了我们明确而又肯定的答案。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ics)这一概念,它有别于康德的道德之上的世界大同思想,也有别于阿尔基布吉(Archibugi)的等级制的世界主义民主思想。相反,它是一种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基础上,自然生成的、跨国的,但又彼此相互影响的,在人类行为体不断位移过程中起着矫正航向作用的认同和意识。^④作者在这一概念基础上,详细研究了好莱坞著名的华人功夫电影导演李安、吴宇森和成龙等的作品。以成龙为例,作者注意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成龙在世界媒体中的名声就越来越响亮,开始是在亚洲,然后蔓延至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这也表明他被越来越多不同国籍和文化的人所接受,而自己也逐步具有了世界视野和世界意识,能够和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人和谐相处,也能够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这些巨大的成功,成龙才能在其后作品的创作、技术运用和管理等方面拥有绝对自主权,不管自己是作者、编剧、导演、制片人,还是纯粹的演员。正是这种对影片的绝对控制行为,可以使他们把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彻底贯穿到作品中去,同时还能吸收和展现其他文化背景的认知与行为。正因为如此,李安、吴宇森和成龙等的作品在如今的全球媒体行业中充分体现了复杂但又明显具有商业和意识形态张力的地缘政治认同。^⑤

① See in David Kenley,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 London: Routledge, 2003.

② Lok Siu *Memories of a Future Home: Diasporic Citizenship of Chinese in Panam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xvii.

③ See in Olivia Khoo, *The Chinese Exotic: Modern Diasporic Feminin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Jing Tsu, David Der-Wei Wang,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Critical Essay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0.

④ Kin Yan Szeto, *The Martial Arts Cinema of the Chinese Diaspora-Ang Lee, John Woo, and Jackie Chan in Hollywood*,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6.

⑤ Kin Yan Szeto, *The Martial Arts Cinema of the Chinese Diaspora-Ang Lee, John Woo, and Jackie Chan in Hollywood*,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

五、结 语

学术研究需要相互交流,只有交流才能互鉴,才能进步。而要实现学术交流,语言是工具,也是关键。但我们通过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文献的梳理后发现,在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华侨华人研究中,中国学者的参与度不高。本文所选取的 26 份样本书籍中涉及的著者、编者以及论文被收集者来自亚洲的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和日本;欧洲的荷兰、英国、挪威、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和卢森堡;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非洲的南非和冈比亚等 24 个国家和地区,共计 153 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只有 5 人。^①之所以会形成这一状况,并非是中国内地学界在华侨华人研究上毫无建树。相反,国内华侨华人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蔚为兴盛,发展到如今,与国际同行相比也不遑多让。^②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内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外语能力不足,这一方面会导致国内学界无法与国际同行进行有效交流,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对相关语言为媒介的文献和信息的掌握能力下降,从而无法追踪世界华侨华人研究的动态和前沿。长此以往,国内华侨华人研究就会在自己的圈子内,自我封闭,自说自话,致使华侨华人研究缺乏国际视野。这不应当是华侨华人研究的科学态度和行为,也不是华侨华人研究这一世界事业应有之内涵,更是与中国作为华侨华人祖籍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在英语还是当今世界学术研究通用语的背景下,国内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理当加强英语的学习和运用,把更多的研究成果通过英语这一语言媒介传播出去,创造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同行去交流与对话,从而在华侨华人研究这一世界事业中烙下鲜明的中国特色。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domestic scholars have reviewed and evaluated research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written mainl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However,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research studies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written in other langua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amining existing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since the 1980s in the field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A thorough review of this body of literature found that publications i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with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have taken variou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1) overseas Chines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been studied; (2) the scholars conducting these research studies also come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countries/regions; and (3) a wide variety of topics have been researched both within and across disciplines. Worth noting and learning are the spirits and practices of diligence, perseverance,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from these scholarly works. In contrast, there still exist certain deficiencies on the part of domestic scholars, such as insufficiency in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and the subsequent lack of effectiveness in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If the above situation can be improved, scholars in China will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important ways that display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张祥熙, 讲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黄凌翊)

① 详见本文表 2。

② 庄国土《回顾与展望: 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载《世界民族》2009 年第 1 期。